

江西“小三线”建设的历史考察

葛维春^a，代祥^{b1}

(宜春学院 a. 科研处; b.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宜春 336000)

摘要: 20 世纪 60 年代初, 在备战背景下, 由于地理条件等原因, 江西被确定为华东地区的重要后方基地。在上级部门的领导和上海、内蒙古等省市区的帮助下, 一些“小三线”工厂迁入江西或在江西开工建设, 江西全力投入“小三线”建设中, 到 70 年代初初步具备了独立生产装备团以下常规武器的能力。改革开放后, 随着国家方针政策的转变, 江西从企业布局、民品开发、机制改革等方面对“小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 以增强活力。江西“小三线”建设在改善产业结构、吸引和培养大批技术骨干、促进江西经济科技发展的同时, 也遗留了不少难题。

关键词: “小三线”建设; 战备; 调整改造; 江西

中图分类号: K2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18)03-0091-07

DOI: 10.13764/j.cnki.ncds.2018.03.012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 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三线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建立稳固后方基地的战略决策和建设三线的号召, 江西迅速开展“小三线”建设。当时, 中共中央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 川、贵、云、陕、甘、宁、青等省区及桂、湘、鄂、豫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属于三线, 沿海、沿边(靠近苏联)的省份属于一线, 介于两者之间的省份属于二线。中共中央要求在三线地区开展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俗称大三线建设, 一、二线地区省份在各自的腹地进行“小三线”建设。学术界对大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较多; 对“小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较少, 且主要围绕上海“小三线”建设展开, 江西“小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很少, 仅谢忠强、张志军、落成蒋等少数学者关注过。与江西等其他地方不同的是, 上海“小三线”企业不在上海本地, 而是分布在皖南、浙西等地, 其人员、设备及物资等皆由上海提供, 并由上海管辖。从全国范围来看, 江西“小三线”因建在江西本地且建设规模仅次于上海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拟对江西“小三线”建设的历史进行初步的考察和探讨, 希望更多的学者关注并展开对江西乃至全国“小三线”建设的研究。

一 江西“小三线”建设的决策分析

20 世纪 60 年代初, 面对日趋恶化的国际环境,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作出了建设以战备为目的的后方工业基地的决定。1964 年 6 月,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假使敌人占领我们的地方, 怎么办? 沿海各省要搞些手榴弹、炸药厂, 军工厂……每个省都要有一、二、三线嘛!”^{[1] (P52)} 同年 10 月 18 日, 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求报告》, 报告主张加强地方军事工业建设。毛泽东在此项报告的批语中再次提出一线、二线各省要考虑第三线问题^[1]

¹收稿日期: 2018-04-1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16JD710079)。

作者简介: 葛维春(1980-), 女, 江西宜春人, 副教授, 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代祥(1981-), 男, 江西九江人, 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P93)。随即，中共中央向各中共分局和各省转发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报告及毛泽东的批语，并要求各地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2] (P35)}。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要求，中共华东局确定江西为华东地区的战略后方，应建成稳固的战备基地。此后，在中共华东局、上海市、福州军区的支持下，江西举全省之力开展“小三线”建设。曾任江西钢厂厂长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钱家铭说：“江西的小三线，实际是华东的小三线。”^{[3] (P115)}江西之所以被确定为华东地区“小三线”的重要后方基地，是因为具有以下方面的因素。

1. 地理环境适宜，符合中共中央建立后方基地的要求

江西省位于东经113° 34′—118° 28′、北纬24° 29′—30° 04′，地处中国中部、华东地区西侧，东邻浙，南连闽，远离沿海，符合中共中央提出的把一些沿海的军工企业搬到二线、三线地方的要求。同时，江西山地、丘陵交错，特别是东、南、西三面环山，峰峦重叠，这种山地、丘陵地貌也适合中共中央提出的“小三线”企业选址“靠山、进洞、分散”的要求。

2. 粮食产出丰盈，基本上能够满足“小三线”相关人员的食品供应

江西地处中亚热带湿润季风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丰沛。全省有赣江、抚河、信江、饶河和修河等五大水系，大小河流2400多条，水资源丰富。由于良好的气候与丰富的水资源非常适宜农作物生长，因此江西历史上就是全国闻名的鱼米之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一直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近现代江西工业基础薄弱。20世纪60年代，江西要大规模建设“小三线”，一方面需要依靠外部力量，一大批机器、外地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必将迁入江西；另一方面随着“小三线”建设的顺利开展，必将需要招收一大批江西本地的转业军人、毕业学生和农民，充当工厂职工。因而，数量庞大的本地职工、内迁人员及其家属的粮食供应是否充足就成为江西“小三线”建设能否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江西粮食产出丰盈，基本上能满足“小三线”建设相关人员的食品供应，从而解决了“小三线”建设的后顾之忧。

3. 充足的电力是“小三线”建设的必要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江西发电量很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江西电力工业迅速恢复，但是仍难以满足需求。为提高发电量，江西一方面极力改造原有的小型火电厂，并扩建南昌水电有限公司和赣州电厂；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水电站，先后开工建设了上犹江水电厂和南昌（七里街）电厂。有资料统计：“‘一五’时期，江西电力工业基本建设投资1.0996亿元，占全省工业总投资额的23.1%。1957年全省发电设备容量达10.8万千瓦，发电量为1.99亿千瓦·时，与1952年相比，分别增长4.14倍和4.69倍。”^{[4] (P2)}到20世纪60年代，江西加快了电力建设的步伐，柘林、江口等水电站和九江、萍乡、乐平、新余、分宜等火电厂先后开工和投产。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发电量的大幅提高，为以军工为主的“小三线”企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保障，这是华东“小三线”建设项目落户江西的重要原因。

4. 交通畅通是“小三线”建设的重要因素

虽然中共中央要求“小三线”企业不要靠近交通干线，要远离大江、大河、大湖及主要桥梁，但是大型的军事工业不可能离开交通，煤及钢铁等原材料和产品都要靠铁路、公路和船舶等交通工具运输。江西的交通便利程度虽然比不上上海、江浙等地，但是总体情况不错。在铁路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江西境内已建成通车的有浙赣铁路和南浔铁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它们进行改造和新线建设，提高了运输能力；20世纪60年代又建成鹰厦线。在水路方面，由于江西北临长江，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等五大水系遍布江西各地，因此水路交通便利。江西的公路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迅速推进。分管“小三线”建设的江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钱家铭就曾回忆说，当时江西钢厂确定建在新余良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条铁路专用线通往新余^{[3] (P115)}。1965年，中共华东局召开了一次关于“小三线”建设的会议。会议强调，地方军工厂的厂址选择应通过实地勘察，区别具体情况，权衡利弊，在坚持“靠山、进洞、分散”的同时，要考虑经济管理、便利生产、便利运输和组织协作等条件^{[5] (P25)}。由此可以看出，交通方面的建设及成效吸引了一些“小三线”工厂迁入江西或在江西

开工建设。

除上述因素之外，煤、铁、铜等自然资源储藏丰富也是部分“小三线”企业落户江西的重要原因。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华东局确定江西为华东后方战略基地后，中共江西省委积极响应，并提出“要把江西建设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华东战略后方”的目标。

二 江西“小三线”建设的起步与军品生产

中共中央、中共华东局、中共江西省委力主把江西打造成华东战略后方基地，此项指导方针很快就落实到各方面的具体政策之中。1965年7月，中共华东局国防工业办公室下发《关于下达1965—1967年后方建设规划的通知》，确定在1965—1967年3年内江西“小三线”建设总项目数为67个，其中军事工业项目23个，相关配套项目44个^{[5] (P20)}。此后，“以备战、备荒、为人民出发”，“抓紧时机，加快‘小三线’和为‘小三线’配套项目的建设”就成为一段时期江西的重要工作^{[6] (P152)}。“立足于战争，争取时间，建设后方，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成为江西“三五”计划的核心任务。1965年，江西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作为“小三线”建设的主要领导机关；同年底，江西又成立了军工局，负责“小三线”工厂的筹建及生产等相关工作。

江西举全省之力，组织大批精干力量，积极投身于“小三线”建设。据记载，当时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委员会从省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动员调出10080名职工支援“小三线”工作，还抽调1000余名专业人员参与“小三线”工程设计^{[5] (P6)}。江西不仅需要负责自己承担的“小三线”企业的设计、施工、设备订货、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及做好各种水、电等配套设备；还需要配合省外施工方组织民工参加工地建设，准备好各种建筑原料，做好迁入江西的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等相关工作。为此，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还动员地方力量投入“小三线”建设。其中，“小三线”企业较多的宜春地区就曾广泛发动民众修建石灰窑和后方公路，生产和运输砖瓦、土方、沙石、石灰、木材等各类物资，全力支援“小三线”建设。

近现代江西工业非常落后，军事工业尤为不堪，因而为确保完成任务，江西“小三线”建设除依靠本省的力量之外，还积极争取省外力量的支援。当时，中共华东局决定由工业实力强劲的上海支援江西“小三线”建设；此外，四川、内蒙古等地也给江西“小三线”建设提供了大力支持。由于江西“小三线”建设的力量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上级决定成立三个建设指挥部以推进江西“小三线”建设：第一建设指挥部负责江西自己承建的项目，第二建设指挥部负责上海支援的包建包产项目，第三建设指挥部负责四川、内蒙古等老军工厂支持的建设项目^{[7] (P329—330)}。除江西自建的项目之外，上海援建的项目占省外建设项目的绝大多数。当时，上海采取包建包产的方式帮助江西建设19个“小三线”工厂。根据《关于上海承担江西小三线项目中生产准备工作的分工协作办法》，包建包产的具体办法是：（1）勘测设计和土木建筑以及厂区内的水、电、气、路等工程建设；（2）设备订货、非标准设备制造和设备安装；（3）按照企业经营管理和生产的需要，把企业的领导班子和劳动力配好；（4）通过样品试制和产品定型，把生产所需的工艺装备做齐、做全，搬入新厂后，按新的工艺路线要求，经过调整，批量生产；（5）按照新厂生产的工艺要求，对产品图纸、工艺文件进行整理补充，达到批量生产的需要。为了尽快建成这些工厂，上海调集大量物资，动员各类干部、科技人员、劳动工人远赴江西，为江西“小三线”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5] (P517)}。

三个建设指挥部同时推进各军工厂和配套项目的建设，江西“小三线”建设由此全面展开；但是由于“文革”动乱造成运力不足、物资供应紧缺及自身建设经验不足等，江西“小三线”企业在基建和生产试制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国家计委、国务院国防工办上报周恩来总理的报告承认1966年“小三线”建设存在一些问题，在基本建设方面没有完成全年计划^{[1] (P230)}。但是经过各方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大部分“小三线”企业顺利投产。1969年6月，9396厂、9353厂、9344厂经国家批准投入生产，成为江西“小三线”第一批投产企业。1970年，江西编制“四五”计划，“备战、备荒、为人民”仍然是重要的指导思想。虽然“四五”计划在后期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柘林电厂、星火化工厂和燎原化工厂等“小三线”项目在调整计划中还是作了重点安排。在“四五”计划期间，大批“小三线”工厂批量生产，进入正常的生产建设时期。

军品生产时期，江西“小三线”企业基本上依靠国家订单，有时能超额完成任务，有时完不成国家任务。完不成国家任务

是由于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一些企业内部混乱；但是从总体上来讲，由于是军工企业，此时的“小三线”企业生产建设基本上能正常进行。20世纪70年代初，江西初步具备了独立生产装备团以下常规武器的能力，基本上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目标，即“力争从1969年至1971年三年内，各大区达到团以下轻兵器、弹药配套成龙，并各有一套三七或五七高射炮厂”^{[1] (P236)}。

三 江西“小三线”建设的调整与改造

20世纪70年代，中国先后与日本、英国、美国建交，与苏联关系也逐渐解冻。在“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共中央认为国际形势总体缓和，国内工作重点应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军事工业建设方面，“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成为主要的指导方针，国家开始对军工减少投入，军品订单下降。随着国家方针的变化，以战备为目的而建设的江西“小三线”企业面临巨大的转型。1979年9月，江西省国防工办向上级单位呈报《地方军工三年调整的初步设想的请示》，主动进行调整改造。江西“小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 调整企业布局，对问题严重的工厂进行关、停、并、转、迁

由于“小三线”建设是在“备战”的局势下上马的，中共中央要求“小三线”企业选址尽可能地“靠山、进洞、分散”，因此不少“小三线”企业建在深山之中，交通极为不便，且配套工厂布局分散。这样的交通环境和外部条件，加上自身经营不善，使部分“小三线”工厂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成本居高不下，竞争乏力，举步维艰，企业布局急需调整。随着国家对三线（也包括“小三线”）企业基本情况的调查深入，对问题严重的企业采取关、停、并、转、迁等措施予以调整改造。如撤销9349厂（江西立新机修厂）和9469厂（江西量具刀具厂），同意9334厂（江西光明机械厂）与南昌自行车厂合并，搬迁9333厂（江西人民机械厂）。其中，9334厂“地处赣西北的九岭山脉，这里山峦重叠、森林茂密，离宜丰县城约45公里，一个叫黄岗的乡村……进出只有一条通县城的三级公路”，“厂外相隔数十公里的芳溪袁坑口的深山里与有我厂配套的先锋机械厂，往院前深山里数十公里处有近邻长青机械厂”^{[3] (P127-128)}。这种交通状况到20世纪80年代也没有得到多大改变，以至于江西光明机械厂的人想搬出深山。按照“能迁并的就不要迁建”的原则，上级部门决定江西光明机械厂与南昌自行车厂合并，迁往南昌。落户省会南昌后，江西光明机械厂的条件改善不少，信息通畅，运输便利，发展步伐加快。曾任江西光明机械厂厂长的程渝龙说：“两厂合并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开拓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越来越显著，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工厂的生产规模及产值利润都达到历史最好时期。”^{[3] (P149)} 9333厂（江西人民机械厂）原厂址在瑞昌县洪下人民公社张家铺大队，离瑞昌县城24km，交通十分不便。根据上级“能就近搬迁的就不要远距离搬迁，能向中小城市搬迁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的要求，江西人民机械厂筹划搬迁至瑞昌县城。“1989年开始，工厂陆续先生产后生活分批搬迁；至1990年初，全厂搬至新厂区”；“1990年，迁入新厂区后，人民厂迎来了民品开发第二个高潮……这样的势头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使企业得以中兴”^{[8] (P3-4)}。在江西省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江西省国防工办的大力支持下，部分“小三线”工厂或关或停或并或搬，逐渐告别大山，为此后企业经营创造了良好条件。

2. 积极开发民品，调整“小三线”企业产品结构

改革开放前，江西“小三线”工厂主要接受国家订单，生产有严格要求、接受严格验收的军品。随着“军民结合”成为国家的指导方针，军品订单急剧减少，江西“小三线”工厂遇到无米下锅、亏损严重的困境。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江西“小三线”工厂主动调整产品结构，面向市场开发民品。如在军品时期主要生产枪炮的9446厂（宜春第一机械厂）在改革开放后没有国家的军品订单，为维持生存和促进发展，先后开发了电风扇、三牙轮钻头 etc 民用产品。其中，“飞龙牌”三牙轮钻头获得极大成功，产品畅销国内外，不仅为工厂带来了效益，还为国家出口创汇作出了贡献，产品也获得了国家银质奖。同处宜春地区的9329厂（江西工具厂）在军品时期主要为江西其他“小三线”工厂生产配套的军品工装，根据上级的要求和订单生产刀、模、夹、量等工具。军转民后，国家任务锐减。为摆脱工厂效益下滑的困境，9329厂扩大生产市场需要量大的千分尺、游标卡尺，并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不同规格的千分尺、游标卡尺，以满足市场需求。江西工具厂也由此进入效益最好的生产时期。民品的开发和生产不仅调整了江西“小三线”工厂的产品结构，也使其不再依赖国家财力支持，为成为面向市场能自谋生路的

企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3. 改革经营机制，增强江西“小三线”企业活力

改革开放前，“小三线”工厂属于军工单位，基本上只承接政府订单，各种物质资源、劳动力都由政府调配。在国防工业部门领导及计委、建委和劳动等部门的配合下，“小三线”企业组织生产，其产品最后由国家验收、收购。这属于典型的计划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提出“军工企业要走军民结合的道路”^{[1] (P280)}。江西“小三线”工厂开始军转民，面向市场生产民品，但原来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经营机制难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改革迫在眉睫。“小三线”企业的经营机制改革主要从财、物、人等方面着手，使其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配置。在财务上，20世纪80年代，江西省国防工办对“小三线”工厂采取财务包干和利润分成的政策，以激发工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1980年6月，江西省财政厅和江西省国防工业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改变我省地方军工企业财务管理方法的联合通知》。通知强调：“为了……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大力发展民品生产，把企业生产经营搞活，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对省国防工办所属地方军工企业实行盈亏包干办法。”主要措施是：“从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省财政对省国防工办所属地方军工企业实行盈亏包干，即以省国防工办为单位，亏损不补，盈利不交，一定五年不变。地方军工企业的盈亏计划、亏损的弥补和盈利的收缴由省国防工办开设银行专户直接与企业办理。”^{[5] (P523)}此后又将包干期延长至1990年，但要求从1985年起利润的20%上交江西省财政厅。在物资、人力调配上，改变计划经济中指令性的做法，把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企业经营自主权增加。“小三线”企业可以自主地调配人力、物力，向重点产品倾斜。如9329厂（江西工具厂）在军转民后，立即扩大生产市场需求广的游标卡尺、千分尺，并把产品出口到国外，而且成效显著。与此同时，江西省人民政府在“小三线”企业中实施厂长负责制，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随着经营机制的转变，江西“小三线”企业的活力逐渐释放出来。

四 江西“小三线”建设的成效与缺失

学界对三线（包括“小三线”）建设评价不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考察江西“小三线”建设，可以辩证地分析其得与失。

1. 建设的成效

首先，“小三线”建设极大地改善了江西的产业结构，促进了江西乃至全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一直以来，江西都是典型的农业省份，工业十分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仅有南昌飞机制造厂等少数重点企业，“一五”时期还不能生产化肥、农药、拖拉机、机引农具等工业品。由于工业起点低，江西单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产业结构，发展速度也较慢。1964年，中共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在一、二线省份开展以军工为主的“小三线”建设，要求把沿海城市的部分工业内迁，这给江西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机会。1965年，江西全省工业总产值仅达到24.1亿元，至1990年则达到425.75亿元，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17.5%上升到1990年的71.4%^{[6] (P364-366)}。农业比重下降，工业比重上升，初步改变了江西工业落后的面貌。虽说江西工业比重的上升不仅仅是因为“小三线”建设，但“小三线”建设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小三线”建设不仅改善了江西的产业结构，而且促进了江西的经济发展。“小三线”工厂搬迁至江西或在江西开工兴建，不仅工厂自身壮大反哺江西，随之而来的修建现代化公路、通水电等也带动附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江西“小三线”工厂的大哥大——1965年开工建设的江西钢厂，“到1990年底，江钢为国家生产钢586万吨、钢材坯500万吨、金属制品12万吨，共实现利税10.605亿元，其中上缴利税9.4亿元，相当于建厂以来国家给该厂全部投资的16.5倍”。其中，“江钢1983年到1988年连续六年保持了生产、经济效益每年递增15%的速度，上缴利税占全省工交企业第一位”，“小三线”企业为江西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钱家铭还曾回忆说：“江西是农业大省，要大兴水利却没有线材，江钢急省所急，仅仅花了七八十万元用了三个多月在型材车间生产出了线材，支援了水利建设。”^{[3] (P124)}正如《中国共产党历史》对三线建设的评价：“这实质上是国民经济布局的一次大调整。”^{[9] (P692)}“对于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作用。”^{[9] (P694)}“小三线”建设对江西乃至全国产业布局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小三线”建设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促进了江西乃至全国科技文化的进步。以军工为核心的“小三线”企业，不管是上海迁入江西的企业，还是江西本地新建的企业，从总体上来说，无论是规模，还是科学技术含量，都远远超过江西原有的本地企业。“小三线”企业的产品开发也极大地促进了江西乃至全国科技文化进步。例如，9304 厂的电-21 引信高氯酸电池 1978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5727 厂的 681 金属非金属复合装甲玻璃钢材料研究 1983 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这些奖项都依赖于一大批有水平、有技术的江西“小三线”人的辛劳努力。为了建设“小三线”，上海曾迁移几万名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进入江西，如由上海无线电三厂包建的 9304 厂（新民机械厂）的员工很多来自上海。朱富林回忆说：“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赣北瑞昌县横港乡双板桥小山村来了一批上海的开拓者……后来造起了工房、民房，架起了 10 千伏高压输电线，迁入了机器设备，陆续从吉林、西安、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一批接着一批有志人士在这里聚焦。”^{[10] (P224)} 朱富林本人于 1969 年由北京调入新民机械厂。在此后的二三十年内，又通过招工、分配等办法引进一大批人才。他们在工作中不辞辛苦，用坚强的意志克服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为江西“小三线”建设默默作出了贡献。

更为重要的是，“小三线”工厂在生产过程中非常注重对青年工人的培养，通过老职工不断的言传身教，把知识和技术传播给青年工人。这样，经过二三十年的“小三线”建设，江西从技术工人严重缺乏，转而拥有了一支政治素质高、专业技术硬、工作能力强、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钱家铭曾介绍江西钢厂在培养人才方面的贡献时说：“江西钢厂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几百万吨钢和钢材，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培养和锻炼了一支有觉悟、有技术、有文化、会管理的职工队伍。这支队伍是江西钢厂所以能发展到今天的基础，也是江西钢厂今后不断发展、争取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的基本条件。……现在可喜的是新一代正在成长，青年职工不断加强自己的政治、文化、技术业务学习，素质将不断地提高，必将在四化建设中发挥聪明才智，作出更大的贡献。”^{[3] (P121-122)}

2. 建设的缺失

“小三线”建设在促进江西乃至全国经济转型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同时，也给江西遗留了不少难题。这些难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在“小三线”工厂办社会，企业成本高，负担重，经济效益不高，妨碍了江西的进一步发展。国营企业办社会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小三线”工厂的情况更加严重。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过分强调战备需要，一些“小三线”工厂建设在山沟里，远离城镇，日常用品的供应面临较大困难；而且“小三线”企业属于军工保密机构，与外界有着天然的壁垒，职工及其家属与外界之间的交流受到限制，这造成职工及其家属在生活上碰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江西“小三线”企业在正常生产的同时，纷纷办起了幼儿园、中小学甚至大专学校，建起了菜场、商店、食堂和医院等生活配套设施，满足职工及其家属生活的需要，不过这些举措却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导致经济效益难以提高。改革开放之后，“小三线”企业需要自主“找米下锅”，负担重的弊端日益突显，不仅影响其调整改造的进程，也不利于江西的改革开放。

二是江西“小三线”企业在调整改造的过程中“病急乱投医”，由于一些失误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严重。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随着军品订单减少，江西“小三线”工厂纷纷开发民品。由于市场环境下企业经营经验不足，一些企业集中上马自行车、缝纫机等项目，造成重复建设，产品堆集，销售困难。还有一些工厂抛开自身优势，完全以畅销作为产品生产依据，这样“饥不择食”，不根据厂情开发民品，最终难以为继。程渝龙曾回忆说：“9334 厂（江西光明机械厂）团委动员、组织女工织毛衣、裁剪缝纫衣服，并进行销售。虽然获得了一些利润，但不久之后不得不停止。”^{[3] (P135)} 9333 厂（江西人民机械厂）也曾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此外，部分“小三线”工厂在关、停的过程中浪费严重，搬迁重建的工厂负债较重，严重地影响民品开发，进而妨碍工厂发展。产品开发不利、工厂债务沉重导致部分企业最终走上破产之路，由此给江西带来了职工安置、医疗、社保等方面的遗留问题。

除以上两个方面之外，如果再从江西整体发展考虑，20 世纪 60 年代“小三线”建设投入过大，也影响了江西农业、轻工业等方面的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 卷曾说：“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三线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如过分突出战备

因素，忽视经济规律，三线建设投资比例不协调，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比例严重失调；过分强调‘靠山、分散、进洞’原则，投资效益差，浪费严重，遗留问题很多。”^{[9] (P829)}

五 结语

从上可以看出，江西“小三线”建设从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军事乃至社会等各方面深刻影响着江西的发展进程。而江西“小三线”建设只是全国21个“小三线”建设中的一个缩影，纵观上海、北京、广东等省市的“小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在建设过程中创造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小）三线精神。当然，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小三线”在建设过程中产生并遗留了一些问题。总之，“小三线”建设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拨开厚重的尘埃，探索、了解这段历史，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认识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政策，继续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深入调查研究，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加强同外界的联系和交流，对当前江西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均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 [1] 陈东林.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 [2] 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决策文献选载 [J]. 党的文献，1995(3) .
- [3] 徐有威，陈东林. 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1辑 [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
- [4] 《江西省电力工业志》编委会. 江西省电力工业志 [M]. 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4.
- [5] 《江西省军事工业志》编委会. 江西省军事工业志 [Z]，2005.
- [6] 江西省人民政府志编纂委员会. 江西省人民政府志：上 [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 [7] 《当代中国的江西》编辑委员会. 当代中国的江西：上 [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 [8] 本书编委会. 我们人民厂：江西“小三线”9333厂实录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 [M]. 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10] 本书编委会. 征程——前进中的江西9304厂 [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